文史资料选辑

第四十一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　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　录

我在中国銀行的一些回忆……馮耿光（1）

忆語随笔……曾毓隽（20）

复辟之役馬厂誓师亲历記……陈文运（33）

我参加討伐张勋复辟之回忆 …… 叶恭綽（51）

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 …… 苏錫麟（59）

吳光新在长江上游的兴敗 …… 費澤普（72）

参战軍与直皖战爭概述 …… 韓世儒（78）

我在王占元幕下的活动片断 …… 楊文愷（90）

直皖战后直系勢力的扩张 …… 湯薌銘（99）

1921年直軍援鄂的经过……张方严（105）

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紀要 …… 宁　武（115）

二次直奉战时閻錫山与直奉皖

軍閥的勾心斗角 ……周　玳（122）

第二次直奉战爭随軍見聞 …… 謝宗陶（141）

吳佩孚敗退天津瑣記 ……潘承祿（158）

吳佩孚之再起与潰敗 ……李炳之（162）

1926年吳佩孚的重返洛阳 …… 王維城（179）

吳佩孚流寓四川五年中的

陰謀活动 …… 黃应乾　陈祖武　刘克俊（183）

张宗昌兴敗紀略 ……王翰鳴（210）

段祺瑞公館見聞 ……王楚卿（236）

China

附注

对《吴光新在长江上游的兴败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第五十一辑二七五页

对《段祺瑞公馆见闻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第五十一辑二七六页

China

我在中国銀行的一些回忆*

馮　耿　光

我自从 1918 年 3 月到中国銀行（以下簡称中行）担任总裁算起，到今年已经有四十五年了。在解放前的三十几年中，1928年前我曾两度担任总裁，以后一直专任常务董事，只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改任高等顾問。解放后，中行改組获得新生，我又重新担任董事，不觉又已十四年。

1918年，我在临城矿务局任督办，这个矿局是由华比銀行投資中外合办的。督办由中国方面委派，薪金按法郎計算，最初待遇很丰，后来因法郎貶値，逐漸降低。馮国璋到北京就代理大总統后，曾有意要我担任陆軍次长，我虽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，但只在很短时期中带过部队，对于政治一向不感兴趣，因此我对于这一职务很觉躊躇。正在这时，王克敏做了財政总长，要想找一个和馮有淵源的人担任中行总裁，遂来拉我去接替他这一职务。我熟思之后，就决定到中行来。四十五年来，我在中行的职务，虽有变更，始終沒有脫离过。現在把我在中行经历的重大事情，就記忆所及，概述数事于下：

---

* 附注：馮耿光字幼伟，广东省中山县人，現年八十一岁，日本士官学校第二期毕业，曾任清政府軍諮府第二厅厅长，北洋政府总統府顾問，中国銀行总裁，新华銀行董事长。解放后，任中国銀行和公私合营銀行董事。这稿为馮口述，由林汉甫記录整理。

China

从反对袁世凱称帝说起

袁世凱称帝前，梁启超、蔡锷等密謀反对。王克敏清末曾在日本任留学生监督，与梁启超結识很早，交情不浅。1913年王在中法实业銀行做中国方面的代表时，曾替袁世凱向該行借到一笔錢，但沒有密切关系。由于他的官癮很大，喜欢热鬧場面，遂经常参与梁、蔡的密謀。我那时是总統府顾問兼临城矿务局督办，事情很閑，也常和他們在一起活动。我們这帮人当时虽对袁认识不清，但贊成共和、反对帝制是一致的。有一天，蔡松坡相识的妓女小凤仙問蔡为什么反对袁世凱做皇帝，蔡說："現在我們大家見面拉拉手就行了，如果让袁做了皇帝，我們就要向他跪拜，那还受得了。"蔡在云南起义后，即率部队进攻四川。唐继尧的部队跟在后面，态度不十分明朗，如果蔡部軍事不很得手，唐部很可能叛变。

就在这时，我到天津，住在利順德飯店，遇見王克敏，他邀我去見进步党負責策划的人——蹇念益(季常)。蹇把当时形势讲給我們听，认为必須北方軍人中有人起来响应，蔡的声势才能壯大，反对帝制的起义才能成功。蹇的意思要我赶快到南京去見馮国璋，劝他早日表明态度。我看到此事关系重大，立即答应下来。这时袁的密探布滿在交通要道和头二等火車中，必須机密行事。当天我就乘三等車南下，到南京时正值午夜一点多钟。我乘車到馮居住的上将軍府(即太平天国天王府旧址)，門卫問我来意，我托辞找馮的上菜工友，混进府去，以免惹人注意。这一上菜工友在前清軍諮府做过事，人很机警，这时是馮的亲信。我与他見面后，即嘱其不要声张，将我引到签押房和馮密談。

馮問到外面情形，我就把各地反对帝制的局势告訴他，并問他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手下有多少軍队，打算怎么办？馮說嫡系軍队有限的很，所以不敢轻率举动。我就乘机进言說，袁派了两路大軍沿着京汉、津浦两铁路南下，表面上是和西南方面作战，实际上对馮也是一种威胁，必须早日表明态度，才是自全之道。馮說："袁是老上司，如何可以反对。"我說："袁如不做皇帝，还可以保全大总统的地位。反对帝制，就是为了袁本人和其子女后代的安全，正是爱护老上司。"馮听了我这番話，劝袁退位的意思才最后决定，立刻吩咐一位賀秘书当晚草拟电稿。次晨我見到馮时，他已坐在那里看电稿，经我一同參酌，稍加潤色，即于是晨6时发出。

这封电报拍发以后，整个政局为之一变。进步党梁启超等通过王克敏和我与馮拉上关系。后来馮任代理大总統，梁任財政总长，王和张嘉璈任中行正副总裁。后王接任財政总长，就約我去接替他的职务。我和馮系前清軍諮府老同事，认识最早，交情也很深，但担任中行总裁，却是梁、王的主意，不是馮自己找我的。

王克敏与张嘉璈在中行

在1918年到1928年間，中行总处主要是由王克敏、张嘉璈和我三人共同负責主持，遇事大家商量，分别联系办理。王和我均先后两度担任总裁，张則一直担任副总裁，具体主持銀行业务，沒有更动过。

我和王很早就认识。他的父亲王子展(存善)，一向在广东做官，交游很广，与我家有世交，因此我和王家父子都很熟悉。王在清末从日本回国，因为他的父亲和直隶总督陈夔龙(筱石)有交情，由陈保举他做天津交涉使。辛亥革命后，馮国璋調任直隶省都督，王仍任交涉使，我曾从中介紹，这是馮、王結识之始。有一次馮在交涉

China

使署宴請各国駐天津領事，馮的卫兵不滿意所发的車飯錢，吵鬧起来，王不顧情面，当場申斥。馮对王的举动不但不見怪，回到都督府还惩办了鬧事的卫兵，因此两人的交情倒反而更深一层。王经手中法实业銀行借款① 时，袁世凱送給他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。那时他因为眼睛不好，住在北京六国飯店，要由人扶到总統府去签字，他回到飯店时，曾拿这张支票要我替他瞧瞧金額，并問我要不要拿点錢去用。我对他开玩笑說："至少要分我一半，少了沒有用。"这笔錢在当时为数不小，很可以供他揮霍一陣。王在北方很久，对于軍政界各方面人物，都有拉攏，人很机警，政治嗅覚也灵敏。我們在这方面时常要靠他代为筹划应付，特别是在曹錕、张作霖等人当权时期，中行对外交涉，都是由他出面进行。他在中行多年，关系很深，但对于行里人事，除了两次大裁員外，很少过問。在历次政潮中，中行也沒有因为王的政治活动而卷入漩渦中去。

张嘉璈是日本庆应大学出身，在未进中行前，曾在浙江省議会和北京參議院做过秘书，很为王家襄所信任。他到中行来，大概是通过进步党的关系② 。他那时年紀很轻，但一般朋友、同事都认为他是政客，有时大家談得很热鬧，他一来到，談鋒馬上冷淡下来。1916年中、交停兌时，张在上海分行任副经理，曾与经理宋汉章共同筹划，抗拒北洋政府停兌命令，照常兌現，在对外宣传联絡方面，做了許多工作，但两人相处始終不甚融洽。宋也是经常用"政客"两个字来形容张的举动。有一个时期"政客"两个字几乎成为张的綽

① 大概是1913年10月的"中法实业借款"。这笔借款为法金一亿佛郎，折合关銀三千九百三十七万余两，而袁世凱政府实收的只有三千零六十八万余两。

② 张嘉璈的哥哥张君勱（嘉森）和梁启超、湯覚頓都是进步党的主要人物。张进中国銀行是在湯覚頓任总裁时期，主要是通过梁的推荐。

China

号。北伐前几年，每逢中行准备发股息时，我就要电約汉口、杭州两行经理同到上海和宋汉章磋商分担垫款办法。有时宋問我的来意，我回答說："这不用我說，你心里也明白。"宋問我垫款几时可还，我說："有錢就还，沒錢就慢点还。"宋认为我說話实在，不像张那样虛伪，說話吞吞吐吐地靠不住，常常約期准还，到期仍然还不了。平心而論，张对于銀行业务经营比較內行，和上海金融界蔣抑厄、李馥蓀、陈光甫等素有联絡，因此在股东会等方面具有一部分力量。他自到行以后，苦心規划行务，貢献很大。宋汉章的話，也只是一面之詞而已。

我和王、张两人結交有先后，彼此性格和能力也各不相同，但有一个共同的看法，即都想把中行办好，必須維持它的相对独立性，尽量扩大商股权益，削弱官股力量，以免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。北洋政府財政部因为需款应用，经常将該部持有的中行股票抵借款項，我們就慫恿他們陆续让售給商业銀行，到北伐前夕，官股为数极少，只剩五万元了。

京钞停兌后的整理

我就任中行总裁时，北京中行鈔票停兌(即不能兌現洋)，已将近两年，市面上鈔票行市时有涨落。北京的銀行、銀号，做这种京鈔买卖投机的很多，其中有一大生銀行的经理，名叫张鴻卿，最为活跃。因此社会上流传的一句联語是："大財神人称燕老（梁士詒字燕孙，有五路財神之称。有人說民五停兌是他的主张)，小錢鬼我怕鴻卿。"可見当时京鈔投机的猖獗了。

北洋政府在宣布停兌时，仅凭国务院一紙命令，上海等地紛起抗命，照常兌現。結果只有北京一地，中交两行(中国、交通两銀

China

行的簡称，下同)发鈔最多，停兌最久，为害也最烈。北洋政府不但放任中、交京鈔在市面上自由买卖，而且还继续向中、交两行大量滥借不兌現的鈔票，推行到市面上去。当1916年5月12日停兌时，中行京鈔发行及存款数共为二千六百余万元，到了1917年12月底，增加到六千五百余万元①，京鈔的行市也跌落到六折。一般机关官吏，拿到不断跌价的鈔票，不能維持生活，叫苦連天。

我就任中行总裁以后，每逢在公共場所，听到人們談到中行京鈔的行市，又已跌到几折了，总覚得非常刺耳，頗想早日設法加以整理恢复兌現，才能对得起社会輿論，否則連中行的生存命运，也要断送了。因此我在最初二、三年中就经常和中行同事在一起研究如何整理京鈔。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时，原有将各国应允緩付的庚子賠款用来整理中、交两行鈔票的拟議。我到中行后，旧事重提，由中、交两行联合呈請政府指定此项緩付賠款及常关税作担保，发行七年长短期公債，归还两行垫款，收回京鈔，总額共計九千三百万元，由1918年5月1日开始发行。但第一次发行的成績不好，截至同年6月29日止，中、交两行共募得四千四百余万元，不及全数之半。且以财政困难，京鈔一面收回，一面发出，增发数实际上超过收回数，鈔价亦随之趋跌，引起各方面的責难。中行乃于同年9月呈报财政部，詳述維持京鈔及整理无效的原因，要求政府不再命令垫发鈔券。輿論方面对于銀行和财政混成一片，攻击尤甚。财政部遂于是月18日行文中、交两行，正式保证不再令两行垫付京鈔。这是整理京鈔的重要关鍵。

中行自停止垫款后頓呈生机，即向各分行及中外各銀行商借

① 这些具体数字和日期，是由記录整理人林汉甫查考有关資料予以补正的。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現金，收縮京鈔。以前售余的公債，也由財政部明令继续发行售募，計自是年10月12日至次年10月4日一年間共募得长短期公債各一千三百余万元，收回京鈔二千六百余万元。中、交两行京鈔流通数目，从1918年4月30日公債发行前的九千三百万元压縮到1919年10月4日的三千八百万元，減少約六成。但中、交京鈔市价仍在五折之間，不但不見上升反而下降。各方面紛紛提出整理办法，中行股东联合会在上海开会时，也有具体建議。适中行修改則例問題又在临时議会引起风波，中行京鈔市价較交行京鈔更为低落。

直到1920年春間，因新銀行团在巴黎組成又有大借款成立之說，鈔价逐步上升到七折。中、交两行认为整理較易着手，便呈請政府发行公債，將京鈔全部收回。但以各地战事又起，未能实現。且因直皖两軍在京津一带作战，人心恐慌，于是鈔价跌到四折左右的历年最低价。其后战事他移，財政部于9月19日重申前請，呈准政府以关余为担保，自10月1日起发行九年整理金融公債六千万元，除以二千四百万元归还銀行墊款外，余数按照票面收回中、交两行京鈔，以四个月为期，并規定逾期以后京鈔停止流通，无論公私机关，不得再有出入，亦不准再有行市。如京鈔持有人及存戶不願购买公債，准其分向中、交两行換立分期归还的現金存单，其利率期限悉与公債相同。所有收回的京鈔，一律切角燒毀。

这时，京鈔数額，已較前大为減少，流通既有限期，商民不敢观望，投机家也受到限制；且多数积存在各路局及税收机关，收銷較易。遂在四个月期限內，发售公債五千八百余万元，除归还銀行墊款外，換回中、交京鈔三千四百余万元。所余公債一百九十余万元，分交中、交两行作为兌換零星京鈔之用。京鈔收回工作至是基本上告一段落。

China

中行因为财政部发給的公债，不敷归还垫款，京鈔轉为存款者顚众，致发出定期存单二千二百余万元，负担甚重，而本身資金不足以应付，乃由王克敏、张嘉璈、吳震修（荣鬯，时任京行副经理）和我共同商量，另行添招商股四百万元，补充实力。不料上海发生证交风潮，因而未能招募足額，头寸仍很紧迫。所有各項京鈔存单自1921年第三期起未能如約履行照付，不得已又与存戶协商仍用金融公債換回前出存单。但中行所存債券，因筹借政府垫款，多已陆续变抵，只好在1922年下半年再向各商业銀行借入金融公債一千万元，以換回存单。所借公債，按照票面金額，分为六十一个月归还本利，由总行及沪、津、汉三行共同負担。这样，中行京鈔存单的結束，又拖延了五年之久。中行董事会在1929年报告中曾指出："其后此六千五百余万不兌現紙币之整理，半由政府发行公債，半由本行自筹資金，其間因应补苴，費十年之力，直至民国十六年，始首尾清結。論国家，論銀行，其受損失，固不待言，而他日談我国币制者，此实一不可忘之事实。"

有些投机商人，在京鈔整理过程中，受到打击，故极力反对、阻挠。交通京行经理胡笔江利用交行京鈔作为投机工具，結交官府在市場上操縱获利，对整理京鈔很不贊成，后来看到反对无效，便挟带投机所得巨資，辞职到上海去。大生銀行张鴻卿曾对我說过："你們政府銀行发行的鈔票，又何必兌現呢？"他虽不懂什么貨币原理，其主张却和国民党政府一样，只是北洋政府的手段，远不如蔣介石国民党那样毒辣罢了。

安福系阴谋夺取中行

1913年頒布的中行則例，規定中行的总裁、副总裁由政府簡

China

任，造成了該行主持人随着財政总长的更換而进退的局面。自从該行正式成立到1917年不到五年期間，前后担任总裁、副总裁的共有十一人之多①，中行就此成为財政部的外府，也是各派政客官僚爭夺的对象。1917年10月梁启超任財政总长时，約請日本財政学家堀江归一博士到北京演讲貨币銀行問題，并就中行修改則例，恢复兌現等事，提供意見。堀江认为"欲恢复兌現，非先停止增发鈔票不可；欲停止增发，非停止垫款不可。然欲停止垫款，則不可不变更組织，使保持銀行之独立，不随政治为轉移"。因此他极力主张正副总裁由政府在股东会所选举的董事中任命。第二年財政部重新修改的中行則例，就采用堀江的建議。則例明文規定总裁、副总裁由政府于董事中簡任，而董事則由股东大会选举，任期四年。我就是由中行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为董事，再由政府簡任为总裁。后来財政总长虽然时有更換，中行正副总裁，按照則例規定，不再随之进退。这样，中行才脱离了北京政局更迭的影响，整个局面开始稳定下来。

孰知到了1919年安福系得势，又发生很大的风波。安福系政客想夺取中行的管理权，借口中行新則例只由馮国璋以代理大总統命令公布施行，当时国会解散，沒有经过立法程序。該系議員乃在临时議会参众两院，提出修改中行則例的新議案，要把总裁、副总裁由董事产生等規定完全取消。但是各地中行商股股东普遍反对，西南軍政府和各地方商会等方面亦都通电指責。北洋政府总統

---

① 自1913年4月中国銀行正式成立到1917年6月，先后担任总裁、副总裁的計有：孙多森(蔭庭)、聶其煒(管臣)；陈威(公孟)、吳乃深(蓋臣)；湯叡(覚頓)、項藻馨(兰生)；薩福琳(桐孙)、李士偉(伯芝)；周自齐(子廙)、徐恩元(荣光)、俞凤韶(寰澄)等十一人。

China

徐世昌和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，看到情势不妙，也主张慎重，該案才以“付审查”为名搁置下来。然而安福系政客并不甘心，仍利用同年4月中行股东会在北京江西会館开会的机会，进行捣乱，串通少数股东到会质問中行当局，企图恢复1913年旧則例，引起激烈的辯論。但因行方握有多数股权，終于否决了他們的提案。这年冬天，該系議員王伊文等又在众議院，提出查办中行正副总裁案。在未提出之前，特托人向我示意，我一笑置之，并致书友人云：“我对于此案不特不为疎通，且盼其成立，依法行查，借明眞相，未始非銀行之福也。国家財政，久无办法，国家銀行，又何能办，故久有求去之意，不过今日尚非其时耳。現在既有責难，只可鎮靜以待，若因此遽行求去，則我将何辞以自解。”等到該案提出通过后，中行即遵陈经过，呈請財政部彻查。財政部派員形式上查了一通后咨复众議院，同时我們又从人事上对該系部分政客进行联絡，軒然大波才平息下来。

1921年中交两行的挤兌风潮

1921年秋冬之交，交通銀行总理曹汝霖搬到北京佟府夹道新房子里去。这房子有一个小型戏台，可以招待一、二百人看戏。亲友們遂在11月16日以祝寿为名，举办了一个堂会，大家湊湊热鬧。孰知戏碼已经排定，将要开演，忽然有人来报告，北京中、交两行同时发生挤兌风潮。那时中、交的不兌現京鈔，已经全部收回，但实力不充，加之財政部在这年又先后向中、交两行借墊軍警餉款四百八十万元及公債基金墊款七百万元，因此新发兌現鈔票的現金准备，极为缺乏；此外还有大量以京鈔掉換的定期存单，流在外面，即将到期。这些因素就是引起挤兌的原因。

China

这次挤兑风潮，因为头寸短缺，两行一开始时便采用限制兑现的办法。每有鈔票五元，只兑付現洋一元，余四元仍付鈔票；且于付款时，故意将現洋反复敲打，手续异常緩慢。只听見叮当叮当的声音不絕于耳，十分热鬧，实际上是为了多拖延时間，少兑出現洋。后来連一点現洋亦不搭付，等于停兑了，于是中、交鈔票在市面上又有了行市，其情形的严重，不亚于1916年的停兑风潮。中、交两行都感到內部空虛，彼此互相探听对方实力情形，生怕倒閉在对方的前头。

当时北京的步軍統領王怀庆对于挤兑风潮，非常注意，曾经会同內务部、京师警察厅共三方面代表，深夜召集中、交总行負責人去談話。我和张嘉璈代表中行，曹汝霖、任振采(凤苞)代表交行，接連去了好几次。王怀庆和內务部、警 察厅的代表坐在长桌的上首，我等坐在下首，問話时态度严肅，一再追問中、交两行的現款到哪里去了，是不是私人挪用了，对于交行尤其不客气。有一次，警察厅长殷鴻寿說："若在外县，发生有錢庄停兑倒閉等情事，经理人是要枷首示众清查財产的。这次在北京城里，客客气气，还不好好交代清楚。"我听后气憤极了，就站起来說："今天我們四个人都在此地，可以暫时拘禁起来，請派大員彻底清查中、交两行賬目。如果有私人挪用公款，以致发生风潮，情願以身家生命抵偿。"王怀庆看到这一局面弄僵了，就說："您不必动气，大家坐下来好好談談，想个办法，应付这个局面。"这才緩和了全場的沉重空气。经过中、交当局向各方面疎通，終于把这事擱下来。因为这次問話，是由三个官厅共同召集的，我們就把它叫做"三堂会审"。

中行的亏空沒有交行大，京、津两行又由沪行宋汉章等装来現洋接济，因而这次风潮，经过半个月的紛扰就解决了。交行风潮拖

China

延較久，最后听說由叶恭綽经手，向奉天省官銀号借到現洋四百万元，于次年1月間对外无限制兌現，才把风潮平息下去。

张志潭是直系大将，在靳云鵬內閣中先后做过农商、內务、交通三部总长，对于中、交两行的态度，显然有所不同。遇有关于銀行方面的事，处处与交行为难，大有非挤垮不可之势。这次风潮发生后，他时常問我交行內容如何。我和他原有世交，彼此相识多年，交情不錯，但他为什么对交行如此痛恨，最初我还不大明白。直等到梁士詒由张作霖保駕做了国务总理，吳佩孚通电攻击张、梁，常要牵涉到交行，才知道这完全是一种派系的傾軋。后来奉系失敗，梁士詒下台，交行发生动搖，幸由股东联合会推举张謇、錢新之（永銘）担任总理、协理，才把局势挽救过来。

几任总裁的更替

我从接任总裁后，先是应付京鈔停兌后的局面。京鈔的整理、兌現刚告一段落，1921年挤兌风潮又突然发生，虽在两星期后就归于平息，我个人却不願再干下去了。我对王克敏說："这一局面，我实在应付不了，还是仍由你来担任总裁吧！"我的母亲也說我年刚四十不宜負此重任。因此第二年（1922年）第二届董事会就改推王克敏为总裁，我退居常务董事之职，副总裁仍由张嘉璈担任。王就职后，因为全行开支庞大，曾大批裁減总处人員，并于次年在济南召集经理会議，商定各分行担負总处开支及維持京行的詳細办法；又組织业务委員会，各分行经理担任委員，共同解决各分行的善后問題。

王接任不过一年光景，又去做財政总长，中行总裁职务，由董事会改推金逸（仍珠）担任。金曾在梁启超任財政总长时做过財政

China

次长，后由浙江兴业銀行叶景葵、蔣抑卮等人推荐，做了中行董事。金在我們这些人中，年事稍长，作风稳健，一切措施，率由旧章，不轻易更动。中行业务，在他任期內，也逐漸走上稳步进展的道路。1926年第三届董事会成立，他继续担任总裁，但因病重不能到行执行职务。王克敏又以其他原因，不便出面，我遂再度被推为总裁。这时北方已在奉軍控制之下，政治、经济紊乱达于极点。

早在1925年，中行香港分行经理員淞孙(祖詒)就写信給北京总处，报告国民党自从1924年改組以后，有国际援助，声势很好。第二年北伐开始，員又报告国民党政府向广州銀錢业借款八十万元，雇用挑夫把現洋放在砖头下面，挑过粤贛边界大庾岭，作为中央銀行的发行准备，并且說北伐軍力量雄厚，組织严密，胜利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可以打敗北方軍閥。王克敏、张嘉璈和我三人在一起商量，认为北方政局腐敗，是我們所亲眼目睹的，軍队不能打仗也是事实，但南方动态究竟如何，却不敢轻易相信，最好能有一人亲自去看看。王、张两人认为我是广东人，如果前去，比較不惹人注意，我也同意以探亲为名回家乡去一趟。

我到广州，看見那里各方面情形，另有一番新气象，和北方完全不同，住了一时就回来。不料路过南京时，被孙传芳知道行踪，派人約我去談話。我原无意見他，但又不便推托，只好勉强去应付一下。孙首先問南方情形如何，“赤化”能不能成功？我推說他的消息灵通，一定比我知道得还清楚。孙进一步用請教的口气征求我的意見說：“你是我們的老前輩(孙是日本士官学校后期学生)，大家可以暢快談談。张作霖是土匪，蔣介石是流氓，两个人都来拉攏我，你看我和那一个人联合比較好？”孙接着又說：“北伐軍很能打仗，不容易抵挡。”我当时心里想，这种重大的事情，岂可以随便答复，

China

只好用空洞的話来搪塞一下。不料我回到北京时，孙已和张作霖搞在一起了。我看到南北政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，就和王克敏、张嘉璈两人商量，由王和我留在北方，应付北洋軍閥，张嘉璈因母病很重，正好赶到上海，就地与国民党联絡，相机应付。这种局面，一直維持到1928年总处搬到上海时为止。

张作霖、蔣介石向中行强迫借款

我在北方多年，熟人很多，維持中行局面，本不致有什么問題。不料有一天，駐在保定的奉軍第三、四方面軍团部，忽然派一参謀到中行总处来找我說，他們有一笔进口押汇的軍火，約值三十万元，在未交貨付款前，洋行方面要求銀行担保，张学良要我以中行名义签字担保。我因茲事关系重大，推說須经董事会通过，而当时各董事散居各地，无从召集，难于照办。对方坚持不允，最后說要派一副官带領宪兵四人护送我到保定去見张学良，当面商量。我想此事不妙，遂找陆軍次长楊毓珣設法。楊說，“千万不可同去，否則便沒有办法。”即由楊亲自找张作霖說明原委，一場虛惊，才算平安渡过。

张嘉璈在上海应付国民党政府的需求，也不是很順利的。他和黃郛、陈其采、錢新之等人，原来都是很熟的朋友。当北伐軍到上海时，国民党就指派陈、錢等人組织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員会，中行由吳震修代表参加。有一次这个委員会議决，先凑二五庫券垫款一百万元，送到南京去，要中、交两行各担任五十万元。先是錢新之与宋汉章商量，宋不允垫借，后由吳向宋劝說，宋仍坚决不答应，并且說，“孙传芳軍队，已经过江来了。”吳看到这事无从下台，就賭气不管，一个人溜出边門跑去看电影。因为这笔垫款发生波折，財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